

## 历史

## 吴大澂与《中俄琿春东界约》

张宗海 张临北

【内容提要】1886年，会办北洋事宜大臣吴大澂奉清政府之命与俄方的勘界大员巴拉诺夫重勘兴凯湖至图们江口的一段中俄边界，并签订了《中俄琿春东界约》。从“喀（K）”字界牌越兴凯湖至乌苏里江口一段水路边界，因吴大澂“未能亲往履勘”，致使后来“产生若干问题”。其最主要者，当属黑瞎子岛问题。在抢占领土、边界划分等问题上，与俄国人的多多益善、寸土必争相比，吴大澂的思维定式，仍然停留在作为天朝之国、礼仪之邦对“外藩”施恩、施德进行感化的层面。

【关键词】吴大澂 《中俄琿春东界约》 晚清边患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3）06-0072-0009

1886年，会办北洋事宜大臣吴大澂奉清政府之命与俄方的勘界大员滨海州军政首长巴拉诺夫（И.Г.Баранов）少将重勘兴凯湖至图们江口的一段中俄边界，并签订了《中俄琿春东界约》。这一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了一百二十多年，但笔者在研究中俄国界东段的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过程中，觉得仍然有诸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可以记取。

### 一、中俄重勘兴凯湖至图们江口一段边界的背景与吴大澂其人

19世纪60年代中期，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乘中国西北地区内乱之机，侵入新疆南部地区，先后占据了喀什、英吉沙、莎车、和田、阿克苏、库车和焉耆，并建立了反动政权。此时，内外交困的清政府对大半个新疆已失去了控制能力。这又给沙俄掠夺中国领土、蓄意改变刚刚按其意图确定的边界提供了时机。1871年沙俄大兵入境，侵占了

中国伊犁地区。

从沙俄侵占中国伊犁地区之始，清政府就曾遣署理伊犁将军荣全多次与之交涉，遭到了对方所谓“俄国并无久占之意，只以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sup>①</sup>的无理拒绝。

面对新疆危机，以左宗棠为代表的部分朝中之士力排非议，坚持“宜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否则“我师日迟，俄人日进，宜全力注意西征，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sup>②</sup>。只有进军新疆，收复失地，才能使海防、塞防得到巩固。这一主张，在当时竟出人意料地被清政府采纳了。

1875年，清政府命陕甘总督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清军进军新疆之前，左宗棠做了

① 王树柅、王学曾总纂：《新疆图志》，《交涉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89页。

② 沈云龙主编：《近代史资料丛刊续辑第65辑《左文襄公（宗棠）全集 奏稿卷四十一—五十三》》，台湾文海出版社1979年版，第1842页、1844页。

【作者简介】张宗海，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张临北，博士，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对俄工作处职员。

精心的策划和充分的准备。阿古柏匪帮此时在新疆十几年，所犯下的令人发指的暴行早已弄得天怒人怨。所以，阿古柏虽有俄、英两国的荫庇，也已无力再苟延下去了。清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新疆南部连克数城，到1877年底阿古柏分子盘踞的新疆土地基本得以收复，为中国政府索还伊犁创造了条件。

次年，清政府派钦差大臣崇厚（1826—1893）出使沙俄谈判归还伊犁问题。清政府派赴俄国的谈判代表崇厚的误国，从另一个侧面又证明了清王朝的腐败和低能。这位对国际外交上的错综复杂情况和伊犁的地理状况一无所知的满洲贵族，被清政府的决策者视为“向能办事，于中外交涉情形亦俱熟悉”<sup>①</sup>。他抵俄以后，一方面被俄国人的阿谀逢迎“弄得晕头转向”，一方面“看来还有点畏惧那些俄国人”。再加上他“急于回国以料理紧迫的家务”，于是便按照沙俄的要求，匆匆与之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伊犁名义上交还了中国，实际上“却将十分之七的土地割给了俄国”。其中包括“具有战略意义的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另外俄国还得到“五百万卢布的赔款”，并有权“在七个重要地点设置领事馆”，以及“可以沿松花江航行直至满洲的伯都讷”等特权<sup>②</sup>。消息传来，朝野震动。朝野有识之士痛斥条约的危害和崇厚的误国。清政府被迫将崇厚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并拒绝承认和批准这一条约。清政府惩办崇厚本属中国内政，而俄国驻华公使竟对此无理取闹，横加干涉，并威胁说：“俄国并非无力量。至于条约准与不准，在俄国总是一样。”<sup>③</sup>沙俄此时又故伎重演，一面对清政府实施外交恫吓，一面又在中俄边境地区集结军队，进行武力威胁。

于是骤然间中俄战争的风云密布。后来任俄滨海州督军的翁特别格在他的《滨海州1856—1898年》一书中写道，“1880年，当俄国和中国在伊犁问题上发生严重纠纷时”，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和阿穆尔河（黑龙江）口不得不“处于防御状态和增加军队的数量”。此外，在继续通过陆路移民的同时，开始从欧俄经海路向南乌苏里地区迁移农业居民，以尽快“使这里繁荣起来”，随时就地“向军队保证供应粮食和补充人员”<sup>④</sup>。边疆的危机，再次威胁到清王朝。

清王朝经历了西方列强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和

瓜分，掀起了标榜“自强”的“练兵制器”活动和以“求富”的经济活动为中心内容的洋务运动。清王朝的军备实力有所增强。1875年，李鸿章受命督办北洋海防事宜，向英、德两国购买军舰，“先练北洋水师一支”。最为重要的是，在密封得像罐头盒子一样的大清朝野，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开始出现。这些人对边防、海防和边界的认识，与咸丰年间清王朝那些所谓的精英相比，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吴大澂（1835—1902），就是当初此类为数不多的有识之士中的一员。

吴大澂，江苏吴县人，字清卿，号恒轩，又号窻斋。同治进士，授编修，后出任陕甘学政，1878年授河北道。他最初被起用到吉林帮办边防，也是时势使然。

在东北边疆，面对邻国的备战，吉林将军铭安感到了巨大的威胁。1880年，他以吉林珲春一带地近俄韩，“边务百废待兴”，奏请“简派贤员赴吉差遣”。直隶总督李鸿章“力保道员吴大澂可资重用”。于是，清廷“乃授吴大澂三品卿衔帮办吉林边防”<sup>⑤</sup>。

1882年，吴大澂赴珲春校阅防军，“得知俄军擅自侵占图们江口俄界黑顶子地方”。黑顶子位于图们江下游北岸，处中、俄、朝交界要冲，北距珲春八十里，与俄界岩杵河隔界相望。俄国人当时已改称此地为萨维洛夫卡。吴大澂深感事态严重。翌年1月，他即“片奏查明俄人擅据黑顶子地方，请颁发咸丰十一年原绘地图为据，由吉林将军派员与俄方订约会勘更正”。他认为，“中俄东界界限模糊不清”，主要是吉林将军衙门存档的地图所画红线“不以所谓海中间之岭为界，是地图条约显有不符之处”。他指出：“该段边界若不及早清理，则珲春与朝鲜毗连之地大半不保，俄隐然觊觎朝鲜之意已可概见，是亟应早为之图。”同年，中法战争爆发，清政府深恐“法夷”又像当年那样打到北

① 王彦威纂：《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光绪四年正月至七月），十三卷，民国二十三年版，第28页。

② [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中译本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光绪五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十八卷，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第11页。

④ [俄]翁特别格：《滨海省1856—1898年》，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9—70页。

⑤ 赵中孚：《清季中俄东三省界务交涉》，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版，第151页。

京，命吴大澂“率吉林防军三千增防京畿”，吴大澂因此离开吉林。

1884年，吴大澂奉派帮办北洋事务。但他仍不忘吉林勘界之事，“乃奏请由总理衙门照会俄驻京公使，订明派员会勘日期，由吉林将军遴派委员前往，会同俄方依照两国画押钤印之旧图，勘明黑顶子地方与图们江口相去里数，由两国会勘官员将黑顶子字样添注图中。如该处在红线之内，则判定系中国地方，据此不难与俄方理论”<sup>①</sup>。

当时，吴大澂面临的难处实在很多。中俄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又称续增条约）推翻了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法定条文，重新规定了中俄两国东部边界的走向。按照中俄《北京条约》第三款规定，1860年12月28日，恭亲王奕訢遂向咸丰皇帝推荐曾随同他“办理俄国事宜”的侍郎宝鋆、成琦，从中简派一员，前往勘界，并于1861年6月28日签订了中俄《勘分东界约记》。但此次中俄勘界，实在是一场极为荒唐的“糊涂勘界”<sup>②</sup>。清廷代表成琦等对边界的具体走向并未实际踏勘，仅按俄方单方面绘制的地图及要求画押钤印。从乌苏里江口到图们江口设立的八个木质界牌，其中六个界牌由俄方单独设立。到19世纪80年代初，“仅有的八处木制界牌或被水冲，或毁于荒火，残留的几处也多糟朽不堪，字迹模糊，有些还被俄人私自搬迁”<sup>③</sup>。在八处界牌中诚如吴大澂所说：“其末处‘土（T）’字界牌最关紧要，”但却“不知何年毁失，遍寻土人，无从查究”。琿春副都统依克唐阿（？—1901）到任以后查阅边界，发现“自琿春河源至图们江口五百余里，竟无界牌一个。黑顶子山濒江一带，久被俄人侵占”。吴大澂初来之时，曾多次“照会俄员索还占地”，并“迭次面商”，“据约辩论”。俄方不仅“一味支吾延宕”，甚至在“黑顶子地方添设卡兵，接通电线，有久假不归之意”。后来，吉林将军希元专派协领穆隆阿、双寿等约同俄员会勘，但“仅至沙草峰”就被俄方阻挡，“未经勘毕而归”<sup>④</sup>。

## 二、吴大澂受命与俄方勘界并签订《中俄琿春东界约》

1884年底，吴大澂奉命赴朝鲜“办理交涉”。全部“办结”之后，他于翌年春就吉林边界重勘一

事，再次“奏请飭总理衙门商同俄方处理”，并陈述说：当年所立“吉林沿边界牌均为木质，年久即告朽毁，如小孤山上倭子牌仅粘纸写牌文，经风雨剥蚀，所存不过数字，无法辨认”。此外，“图们江口沙草峰‘土’字界牌虽经光绪三年重建，然已踪迹全无。‘乌’字界牌为中俄东界牌之首，然地图中虽经注明，交界记文却无，显然二者必有一误”。1885年秋，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照会吉林将军，同意“中俄互派委员”，于次年重勘吉林中俄边界。大清总理衙门顺水推舟，“请旨简派吴大澂为全权勘界大臣，依时前往办理”<sup>⑤</sup>。

1886年2月20日（光绪十二年正月十七），吴大澂仅带随员沈韵松、吴文伯及同文馆俄文翻译庆锡安三人，轻车简从自天津启程向吉林将军衙门的驻地吉林古城进发，以便在春暖解冻后即与俄方进行勘界。途中，吴大澂在吉林参观了宋渤生太守“一手布置”的兵器厂，见识了吉林的“自造单筒小炮”。他还会见了去岁在俄界探察凡129天的曹廷杰。曹廷杰“以手拓混同江东岸古碑四纸见赠，其一大碑正书上有‘重建永宁寺记’六字横列”。吴大澂称赞曹廷杰“采访俄事至此，并手拓二碑以归，亦可谓壮矣”<sup>⑥</sup>。经过一个半月的晓行夜宿，吴大澂于4月5日抵达琿春。

4月7日，吴大澂即向俄方的勘界大员滨海州军政首长巴拉诺夫少将发出了进行会晤的照会。此前，巴拉诺夫曾在俄阿穆尔州任军政首长，与中国人打交道很有经验。4月14日，俄方的界务官马秋宁（Н.Магюнин）携翻译来琿春会见了吴大澂。他向吴大澂通报说，巴拉诺夫“须俟北路乌苏里江、兴凯湖冰冻全消，方可乘轮而来”。时间约在俄历5月初。马秋宁向吴大澂索阅汉文“条约及交界道路记文”，吴“飭文案房抄一份与之”。吴大澂也向马秋宁索俄文文本，马秋宁因未随身携带，吴“允俟归后寄来”。在等候巴拉诺夫的日子里，他一面

① 赵中孚：《清季中俄东三省界务交涉》，第151—153页。

② 姜长斌：《中俄国界东段的演变》，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页。

③ 步平等：《东北国际约章汇释（1689—1919）》，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

④ 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 初集：松漠记闻、皇华纪程等》，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49页。

⑤ 赵中孚：《清季中俄东三省界务交涉》，第154—155页。

⑥ 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 初集：松漠记闻、皇华纪程等》，第303—305页。

将“预拟边界事宜”，“应议各条”交庆锡安译成俄文，“以便临时辩难”；一面检阅边防军的军事演练，亲自观看他们“演放水雷、地雷”，“演放格林炮，并打二百步枪靶”<sup>①</sup>。

此次勘界要解决的问题，用吴大澂的话说：首在“重立‘土’字界牌交界之处”，“次则归还黑顶子要隘之地”。吴大澂始终在为此做着细致、充分的准备。

5月22日，吴大澂与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前赴岩杵河（位于珲春东60多华里的俄境），会晤将在此处与之进行谈判的巴拉诺夫。在吴大澂行至距“恒道河俄卡”约“五里许”的地方，俄卡官员持巴拉诺夫名片带领“马队六十名”前来迎接，“及抵俄卡，又有俄国统领克拉多在卡迎接”。23日，吴大澂抵岩杵河，“俄兵站队迎道”，“旁观者如堵”，晚7时，巴拉诺夫设宴“招饮”<sup>②</sup>。俄方对待大清勘界大臣吴大澂的态度，与25年前对成琦之辈相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5月25日，中俄岩杵河会议开始。吴大澂首先提出，按照1861年中俄《勘分东界约记》之规定，在距图们江口20华里地方补立“土”字界牌。这一即使是承认了当年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合理要求，也遭到了巴拉诺夫的反。巴拉诺夫坚持将“土”字界牌补立在当年由俄方单方所立之地，此地距图们江口44华里。他手执当年中俄勘界时由俄方单独绘制、并由回宁古塔去过大烟瘾的吉勒图堪事先“具结”的旧图，毫不退让。参与谈判的俄方勘界第二号大员、俄总参谋部军事地形测绘局局长舒利经（Шульгин）少将就是“当时亲自绘图树立界牌之人”。他“言之确凿，并呈出大小图稿”。吴大澂紧紧抓住所订条约是勘界的根本依据，对巴拉诺夫进行辩驳。他强调：“应照《条约》记文，由海口量准中国里二十里，即在江边补立‘土’字牌，方可与《条约》相符。”巴拉诺夫狡辩说：“海水灌入之地，当谓之海河，除去海河二十里，才算图们江口。”吴大澂反驳说：“海口即江口有何分别？若论海水所灌，潮来时海水进口不止二十里，潮退时江水出口亦不止二十里。所谓江口者，总在海滩近处，仍须照约由海口量准二十里方为妥恰。”吴大澂的辩驳有理有据，巴拉诺夫最后无言以对，只得应允“电报总督，转达俄廷请示办理，俟有回电再行续议”<sup>③</sup>。中俄岩杵河首次会议到此结束。

5月29日中俄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所议问题逐步展开，并取得以下初步成果：

1. 按照“俄国新图”，自长岭分水岭以下各河，“水归图们江者属中国，水归海者属俄国。”

2. 巴拉诺夫已奉上方指令，“土”字界牌，“从前既未立妥，自可酌量更改”。于是，双方拟定：“土”字界牌由原来的沙草峰地方“挪前十八里”，立于山南沿江高坡下，“约计离海口不过二十四五里”，再往前，“沙土浮松”，恐无法树立。

3. “土”字界牌与“帕”字界牌相距太远。双方拟定：在“蒙古街往来之道”增立“啦（P）”字界牌；在阿济密往来之道增立“萨（C）”字界牌；在“拉”、“那”字界牌之间增立“玛（M）”字界牌；将三岔口小孤山上所立之“倭”字界牌移至瑚布图河口；由“倭”字界牌向北至“那”字界牌，由“那”字界牌北至东大川一带，依“南北直线划定界沟”<sup>④</sup>。

在此次会议中，当吴大澂提出“图们江出海之口应作中俄两国公共海口”时，巴拉诺夫遂以“未敢遽允”，“仍以电商总督再行定义”作答。

5月31日，吴大澂返回珲春。翌日，令随员沈韵松至图们江勘明补立“土”字界牌之地。6月2日，吴大澂拟就“勘界记文稿六条”。6月4日，巴拉诺夫带随员前来珲春。

6月7日，中俄双方在珲春开始第三次会议。会议首先逐条商酌了吴大澂拟就的“勘界记文稿六条”；然后议定了补立“土”字界牌、增立“啦（P）”字界牌、“萨（C）”字界牌、“玛（M）”字界牌以及“收还黑顶子地方”。关于“收还黑顶子地方”，专款列入了中俄《珲春东界约》。规定：“中国界内黑顶子地方旧有俄国卡伦民房，议明于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六月（光绪十二年五月）迁回俄境。两国勘界大臣各派委员前往该处交接明白。”<sup>⑤</sup>关于“那”字界牌，双方又产生争议，“辩论未决”。

巴拉诺夫以1861年所立“那”字界牌早已不知去向，而是由俄方界务官马秋宁1877年与宁古

① 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 初集：松漠记闻、皇华纪程等》，第314—319页。

② 同上，第349页。

③ 同上，第320页。

④ 同上，第321页。

⑤ 《中俄边界条约集》（俄文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89页。

塔副都统双福所补立，与旧图不符，主张重新派员查勘，并照原图将“那”字界牌立于横山会处。巴拉诺夫之意，由“那”字界牌划一直线，与“倭”字界牌南北相对，“方是照约办理”。吴大澂认为：旧有之界牌若已缺失，“自应补立”，“未设之牌，亦可添设”，但原有之界牌若还存在，则“不可稍移”。巴拉诺夫答道：“那”字界牌的位置若不更正，那么“倭”字界牌也应照旧址设立，这样，“界线挪西不少”，中国将会“吃亏”。即便如此，吴大澂亦毫不松动，坚持“那”字界牌“无论与旧图准与不准，总是两国派员监立之牌”，并非中国官员私立，因此，“实不能应允”。也就是说，“那”字界牌即使立错了地方，也不能更改。巴拉诺夫质问说：“两国派员会勘，原为更正错误，若有错误而不更正，何用查勘？”吴大澂的回答让我们找到了他这次与俄勘界，为何只到“喀”（K）字界牌就止步的缘由所在。他说，他这次前来会勘边界，“专为图们江补立‘土’字界牌，并收回黑顶子地方。但将此一段地方分好，绘图画押，即可还京复命。东大川之事，不过顺道一往。查勘此事，本归地方官办理。大澂可不问也”。闻听此言，巴拉诺夫遂不再辩驳，双方相约“再行订期同至图们江会勘‘土’字界牌之地”<sup>①</sup>。翌日，巴拉诺夫返回岩杵河。

吴大澂与巴拉诺夫原来约定，6月17日启程赴图们江沙草峰南树立“土”字界牌，因大雨而延迟一天。18日，中俄双方勘界大员如期而至，在立牌地方掘土奠基。翌日，吴大澂与巴拉诺夫监立石质“土”字界牌。新立石质“土”字界牌至海口13.5俄里，即27华里。至此，吴大澂的两项主要任务已经完成。

6月25日，中俄双方勘界大员在岩杵河进行第四次会议。商定记文内“七条事宜”。其中五条均已议定，交笔帖式阿察本译成满文，再由满文译成俄文。其余两条暂时未获结果。一是关于“图们江口中国船只出入，俄国不得阻拦一条”，巴拉诺夫“已函商俄京外部大臣，尚无复音”。二是“倭”字界牌和“那”字界牌须“俟履勘明白，再行定义”<sup>②</sup>。

7月4日，吴大澂与巴拉诺夫在岩杵河举行第五次会晤。先将“记文”（《中俄珲春东界约》）<sup>③</sup>“画押钤印，彼此互换”。至于各段道路记文及地图，尚需具体实际工作，因此“尚未画押”。8日，第一段道路记文及地图双方“画

押钤印，两国各存一份”。同日，吴大澂乘俄船与巴拉诺夫至摩阔崴（俄称波谢特），由此经绥芬河口、双城子（俄称乌苏里斯克），11日至三岔口（位于现在的东宁县境）。1882年，吴大澂曾在三岔口“起盖官房招商招垦”。重来此地，看到“不数年间”三岔口竟然“农工商贾各有欣欣向荣之意”，他“不觉喜形于色”。14日，吴大澂与俄官马秋宁“同至小孤山查阅‘倭’字界牌”。16日，吴大澂在瑚布图河口找到俄方界务官马秋宁与宁古塔副都统双福所补立之“那”字界牌。在用指南针“测对方向之后”，他指出：“从前宁古塔查界委员皆称‘那’字界牌之西北为东大川，亦约略之词，未用指南针测准也。”可见，1877年在补立此界牌之时，对其方位没有进行准确的勘测。24日，吴大澂得知舒利经<sup>④</sup>已经找到1861年“原立之‘那’字界牌”，“其地在小绥芬河迤东，与旧图亦相合也”<sup>⑤</sup>。

7月27日，吴大澂与巴拉诺夫在岩杵河进行第六次会议。双方议定：其一，在原“那”字界牌之地，先“掘地数尺”，“用碎石竖筑台基”，待“冬令冰坚”，再将“那”字石质界牌树立。届时“再由两国大员另派委员共同监立”。其二，小孤山上“倭”字界牌与1861年成琦所定记文不符，应改设瑚布图河口。所议定之事，俄方“均由舒利经一手经理”，中方在吴大澂与依克唐阿商议后，决定由托伦托勒、永顺“随同照料”，“期于一月内妥速办竣”<sup>⑥</sup>。会议之后，吴大澂经双城子赴海参崴。

8月2日，奉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之命，丁汝昌（？—1895）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六舰由朝鲜元山驶抵海参崴。翌日，巴拉诺夫与参与勘界的俄方人员登“定远”舰参观。在“定远”舰上，“俄官周历炮台及机器舱，啧啧称羨不已”。6日，吴大澂与巴拉诺夫等乘“定远”舰与其他五舰返摩阔崴。丁汝昌定于7日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四舰开往日本长崎“上油”，留“超勇”、“扬威”二舰停泊在摩阔崴。吴大澂不无得

① 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 初集：松漠记闻、皇华纪程等》，第323—324页。

② 同上，第325—326页。

③ 《中俄边界条约集》，第88—90页。

④ 同上，第124页。

⑤ 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 初集：松漠记闻、皇华纪程等》，第331页。

⑥ 同上，第329—330页。

意地写道：“候界务事竣即可乘轮回津也。”<sup>①</sup>清朝首次向北方的强邻展示了自己的海上实力。

8月25日，吴大澂由珲春再抵岩杵河。26日，吴大澂与巴拉诺夫举行第七次会议。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图们江口中国行船不得拦阻一节”。巴拉诺夫以前总是回说“已函商俄京外部大臣，尚无复音”。这次竟又提出，让清廷的总理衙门与俄国驻北京的公使去“商议”。吴大澂不允，此案又告悬置。此次会议，吴大澂与巴拉诺夫还讨论了一个看似与本次勘界无关的问题，即英国占据朝鲜南部的巨文岛，“扼海参崴俄船出入之路”。清政府多次敦促英国退出巨文岛，英方总以其若退出，俄国必占为由一再推诿。讨论至此，巴拉诺夫说俄国没有覬觐朝鲜寸土之心。吴大澂答曰，既然如此，我们“可否立一私约为据”。这样，中国可以借此谴责英国人，促其退出巨文岛。巴拉诺夫认为没有必要立约，英国人若退出巨文岛，俄国人不会去强行占有，“此可一言为信也”<sup>②</sup>。因此，后来有的中国学者认为，“沙俄企图利用清政府对抗英国”，所以才在“归还黑顶子、图们江口行船问题上，对中国做了一些微小的‘让步’”<sup>③</sup>。

自8月26日与巴拉诺夫会晤之后，直至10月12日，吴大澂始终未离开岩杵河。其间，他亲自做了一些具体工作：如阅读交界图稿，草拟交界道路记文，观看“各俄员所绘地图稿”，书写交界地图汉字，到绘图处“校对第六段记文山水名”等。此外，他于10月2日，再次与俄方“会议图们江口行船事”。

10月12日，南乌苏里界务官（马秋宁）照会珲春副都统，称：接滨海州督军（巴拉诺夫）指示，令本属各官，如有中国船只由图们江口出入，不可阻拦。这份地方官员的照会并未列入会议记文。同日，将已经准备工作多日的所订六段交界道路记文及交界详图，“由双方签押各自收存”。至此，此次中俄勘界，经历近四个半月共八次会议，终告结束。

10月16日，吴大澂由海参崴乘船返回天津，10月29日进京复命<sup>④</sup>。事后，中方在长岭子中俄交界处自立铜柱一座，高4.15公尺，宽1.05公尺。立此铜柱，本是吴大澂预先策划。他在由天津赴珲春经过吉林时，曾于3月20日“自书铜柱铭”交宋渤生太守代为刻制。吴大澂的篆书铭文如下：“光

绪十二年四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吴大澂、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奉命会勘中俄边界，即竣事，立此铜柱，铭曰：疆域有表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中国素有铸鼎、立碑记事之传统。吴大澂作为一个精于金石学和古文字学的封建官僚自不例外。但他亲书的铭文似乎不像反映了他“对沙俄随意移动界标、蚕食中国领土的忧患心理”<sup>⑤</sup>，而像在为自己表功。可叹的是，根据民国十三年王世选、梅文昭编纂的《宁安县志》的记载，此铜柱后来“竟为邻俄窃移伯利博物院中”<sup>⑥</sup>。

此次中俄重勘珲春东界的成果，全部记录在六段交界记文之中<sup>⑦</sup>。其六段边界，从图们江口“土”字界牌到白稜河口“喀(K)”字界牌除重新补立、增立石质界牌外，又增设界标26处。第一段自“土”字界牌至长岭天文台，界牌一座，界标8处；第二段自长岭天文台至蒙古街“啦(P)”字界牌，界牌两座，界标8处；第三段自“啦(P)”字界至瑚布图河口，界牌两座，无界标；第四段自瑚布图河口至“那(H)”字界牌，界牌两座，界标4处；第五段自“那(H)”字界牌至“玛(M)”字界牌，界牌一座，界标3处；第六段自“玛(M)”字界牌至“喀(K)”字界牌，界牌两座，界标3处。

近十多年来，在中俄关系研究领域成果颇丰的俄罗斯学者B.拉林教授对中俄本次勘界做出这样的评述：1882年，“清政府明显不满意1860年边界划界的结果，它特别忧心的是，帝国的东北各省已经失去了前往日本海的出海口，于是对波谢特湾沿海部分提出了要求”。清政府的计划包括，“占有整个图们江左岸至江口的地区，不仅要恢复通向日本海的直接通道，而且切断俄罗斯同朝鲜的联系。争论的中心是萨维洛夫卡平原（中国称之为黑顶子），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住满了朝鲜人”。这样，“为了调解1883—1884年间发生的冲突，从图们江口到兴凯湖的这一段边界又重新进行了划分。某

① 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 初集：松漠记闻、皇华纪程等》，第334—335页。

② 同上，第337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沙俄侵华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28页。

④ 赵中孚：《清季中俄东三省界务交涉》，第160—161页。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沙俄侵华史》第二卷，第227页。

⑥ 李兴盛主编：黑水丛书：《秋笈余韵（外十八种）》，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4—1905页。

⑦ 《中俄边界条约集》，第91—98页。

些点的天文坐标重新进行了计算，并绘成了新的边界地图，木制的界牌换成了石头的”。双方全权大员依照1860年《北京条约》，对边界线的走向进行了查验，尤其是“针对最初树立的界牌做了非常重要的修正和补充：‘土’字界牌、那字界牌和倭字界牌变动了位置；在‘土’字界牌和帕字界牌之间设置了萨字和啦字石质界牌；在那字和拉字界牌之间又补设了玛字界牌。除了新增设的石制界牌之外，原有的木质界牌全部换成了石质。这在实际上意味着，俄罗斯被迫放弃了黑顶子平原，而‘土’字界牌则设在了与1861年的位置不同的地方。此外，备忘录的第四款还确认了中国船只沿图们江航行的权利”<sup>①</sup>。

### 三、吴大澂此次与俄勘界的局限与后果

就吴大澂本人的这次勘界而言，中国台湾学者赵中孚先生的评述比较客观。他说，本次吉林东界交涉一案，其最大意义在于，“除吉林兴凯湖至图们江一段中俄界线得因此详予勘定，减少两国界务纠纷外，双方在交涉中均无巨大得失可言。中国方面，论者多有谓吴大澂争回黑顶子地方，为近代交涉中稀有之成就，谅以仅系指交涉精神而言”。至于图们江口行船权利之取得，无非使“珲春本地商船渔船可以自由出入，不必定向俄方取照而已；何况此所谓航行之权，仅止于地方官互为约定，约无明文，俄国可随时废弃承诺，禁止中国船只使用该段介于俄、韩间江口航道”。此外，吴大澂只是具体勘明了自从图们江口“土”字界牌到兴凯湖的边界，从“喀(K)”字界牌越兴凯湖至乌苏里江口一段水路边界，因吴大澂“未能亲往履勘”，致使后来“产生若干问题”。其最主要者，当属黑瞎子岛问题。

1861年，按照成琦同卡扎凯维奇“应立界牌，各差小官竖立”的约定，三姓副都统富尼扬阿同俄官吉成克设立的“耶(E)”字界牌，从一开始就为后来的所谓“黑瞎子岛问题”埋下了隐患。当时所立木牌，就以“江口地址低洼”，未按条约规定所立。此次重勘边界，吴大澂又未能躬躬，他当时就没有做此打算。在与巴拉诺夫第三次会晤时吴大澂曾强调：他这次前来会勘边界，“专为图们江补立‘土’字界牌，并收回黑顶子地方。但将此一段

地方分好，绘图画押，即可还京复命”。这就让精明的俄国人在乌苏里江口补立“耶(E)”字界牌时，成功地施展了一场骗术。换立界牌（将木质换为石质）的俄官“勾结俄籍华人纪凤台等”，谎称在通江子（靠中国一侧连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一条水道，又称抚远水道）流入乌苏里江之处的卡扎凯维奇沃“发现木牌，乃就该处换立石牌”。根据日后俄方出示的“耶(E)”字界牌的换文记录，“文尾署名中国方面勘换界牌官员，竟为协领顺凌、通事佟敖三、纪凤台三人”。此后，“耶(E)”字界牌又被“俄人由乌苏里江东岸移至华界乌苏里镇，旋不知去向”。“耶(E)”字界牌失踪后，“中俄双方均不承认对方所指立界处所”<sup>②</sup>。

纪凤台，这个在中俄关系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还在曹廷杰1885年考察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地区时，就给后人留下了对其印象不佳的文字。曹廷杰说，纪凤台是山东黄县人，在伯力（俄称哈巴罗夫斯克）“交结俄官最密”，“各处俄人无不知有纪凤台者”，“华人贸易下江，不经其手以分利，每被俄害”。尽管曹廷杰曾三次到伯力，纪凤台都“款洽殷勤”，又送礼给他，又“代觅轮船”，然曹氏“以大义揆之”，还是认为此人是“华貌俄心”，“实为边防大患”<sup>③</sup>。

纪凤台最初由烟台来到伯力做买卖、搞工程承包。在曹廷杰赴俄考察之时，他已是黑龙江中部地区最大的毛皮收购商之一。日俄战争期间，纪凤台为俄国做出了巨大牺牲。日本当局曾缺席“判他死刑”，并“没收他在满洲和关东省的全部财产”。尽管如此，纪凤台死后，其亲属提出对死者按照东正教仪式进行祭祷的请求，还是遭到俄东正教会的拒绝。其理由是“纪凤台始终是忠于孔夫子的”。1910年1月12日，纪凤台的遗体由彼得堡运回哈尔滨安葬。有俄罗斯学者说，“尽管他对俄罗斯一往情深，但他始终是中国的儿子”<sup>④</sup>。

纪凤台由于在俄方就“耶(E)”字界牌的位置所施展的骗术中做了伪证，永远背上了“汉奸、

① Ларин В.Л. Китай и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России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90-х: проблемы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98. С.185-187.

② 赵中孚：《清季中俄东三省界务交涉》，第162—164页。

③ 丛佩远、赵鸣岐编：《曹廷杰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7—128页。

④ Нестерова Е. Китайцы на Российском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люди и судьбы // Диаспоры. 2003. №2.

卖国贼”<sup>①</sup>的骂名。但令人痛心的是，俄国人的偷梁换柱、指鹿为马，不但违背了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也违背了通行的国际法。它使中国后来再次在领土和乌苏里江口的行船权利受到损失，极大地伤害了已经觉醒了的中华民族的自尊。国际法规定，两国划界，江河应以主航道划分，中俄边界经过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汇合处，黑瞎子岛地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合处的中国一侧，无疑是中国的领土。但俄国人强指“乌苏里镇为立界处所”、“通江子为乌苏里主流”，为后来霸占中国的黑瞎子岛、控制中国船只前出乌苏里江口制造了依据。如果说19世纪60年代以肃顺、成琦为代表的清王朝的精英们对此还一无所知，那么到了80年代，吴大澂等人在这方面的认识已经有了长足的长进。只是吴大澂等人的长进，是与其前辈肃顺、成琦比较而言的。在抢占领土、边界划分等问题上，与俄国人为代表的洋人们的多多益善、寸土必争相比，吴大澂等人的思维定式，仍然停留在作为天朝之国、礼仪之邦对“外藩”施恩、施德进行感化的层面。

在吴大澂与巴拉诺夫的第六次会议上，双方曾议定小孤山上“倭”字界牌与1861年成琦所定记文不符，应改设瑚布图河口。此事连同竖立“那”字石质界牌，俄方“均由舒利经一手经理”，中方决定由托伦托勒、永顺“随同照料”。托伦托勒与舒利经在瑚布图河口一同勘定了竖立“倭”字界牌的地点，并做了标记。托伦托勒在原地等待竖立石牌之时，舒利经竟然私下指使俄国边民“将原标西移，几逾四里有余”，强行把已经制好的石质“倭”字界牌竖立。此时，愤怒至极的托伦托勒跳入“坑内”，大声疾呼“我身可埋，界不可移！”此事闹到在岩杵河的吴大澂那里，吴安慰托伦托勒说：“界已定矣，何必拘此微末！”清王朝的精英们就是如此“不拘微末”地把大好河山先后送给俄国150多万平方千米。对一个小小佐领的如此壮举，后人感叹说：“清疆吏倘尽如之，边陲土地何致损失尺寸耶？”<sup>②</sup>吴大澂的这次勘界，是纠正“耶(E)”字界牌错立的绝好机会。由于他没有亲自继续勘定自“喀(K)”字界牌至“耶(E)”字界牌这段水路边界，终于使俄方有机可乘，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历史遗患。对此，也不能苛责于他。对勘分这段

水上边界的认识，吴大澂或许同当年的成琦一样，认为“乌苏里江口而南上至兴凯湖”，“界限分明，无多勘议”。再说，吴大澂已经声明，此次他来与俄方勘界的主要任务，专为图们江补立“土”字界牌，并收回黑顶子地方。一旦任务完成，即可还京复命，其他之事，由地方官员办理。

吴大澂及其身后的李鸿章，直至大清朝廷更不可能采纳曹廷杰“彼若不许我，不如及此一战”的直谏。清王朝继承并发展了历代中国封建王朝对内乱残酷镇压，对外侮“妥为羁縻”、隐忍求全、韬光养晦、以和为贵的政治文化。在清王朝当时的官员队伍中，吴大澂可谓既有见地、又务实能干的一员，但他绝不会跳出朝廷划定的圈圈，像与清政府签订《中俄瑷珲条约》的俄国的穆拉维约夫之辈，只要他们认为对俄国有利，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就先斩后奏，大胆去干。而吴大澂之辈，若不与清朝廷保持一致，丢官事小，落个满门抄斩，岂不更不划算。而不谙中国大皇帝“德化”的“俄夷”们，若触怒了沙皇，至多流放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而已。所以，谨小慎微，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成为历代中国封建官僚的护身武器，并非偶然。

1917年，统治俄国三百余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垮台。此时中国虽已推翻了皇帝，但革命的结果是军阀割据，南北政府对峙，中国再次失去与俄重新勘界的机会。待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刚刚在俄国站稳脚跟，对于始终处于弱势的中国，更表现了其无可商量的强势。1929年，中东路事件爆发。苏联不失时机地在中国东北中苏边界地区打了一场地面、空中相结合的立体战争，在教训“南京手中的工具”<sup>③</sup>张学良的同时，顺手把黑瞎子岛强占。这样，本属中国的黑瞎子岛，由于成琦之辈的颞颥误国、吴大澂的有始无终，就完全处于苏联的控制之下了。

(责任编辑 刘阳)

① 刘远图：《关于历史上中俄边界“耶”字牌的考察》，载《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

② 李兴盛主编：黑水丛书：《秋笈余韵（外十八种）》，第2242—2243页。

③ [苏]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77页。



## WU Dacheng and *Sino-Russia Hun Chun East Border Treaty*

ZHANG Zonghai, ZHANG Linbei

**Abstract:** In 1886, Beiyang affairs minister Wu Dacheng, carried with the order of Qing government, meet with Russian officials, Baranov, revise the Sino-Russia border from Xing Kai lake to Tu Men, From “Ka” letter stele to Xing Kai lake, then to Wusulijiang River, because Wu did not come to these places, leaving some problems. The most serious problem is Heixiazi Island. The problems are about occupied territory, boundary division mainly. Compared with Baranov’s idea like “the more the better” and “fight for every inch of land”, Wu’s thought is in the form of “Celestial Empire”, and “broad mercy” level.

**Key words:** Wu Dacheng; *Sino-Russia Hun Chun East Border Treaty*; foreign invasion in late Qing Dynasty

### У Дачэн и Хуньчуньский протокол о демаркации восточного участка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ой границы (Протоколы произведенной в 1886 году проверки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ой границы, установленной в 1861 году на основании Пекинского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го трактата 1860 года)

Чжан Цзунхай, Чжан Линьбэй

**【Аннотация】** В 1886 году эмиссар пекинского двора У Дачэн и военный губернатор Примо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генерал-майор Баранов провели проверку прохожд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ой границы на участке от озера Ханка до реки Туманная и подписали Хуньчуньский протокол о демаркации восточного участка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ой границы (Протоколы произведенной в 1886 году проверки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ой границы, установленной в 1861 году на основании Пекинского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го трактата 1860 года). Так как на участке водной границы от пограничного столба с литерой “К” через озеро Ханка до устья реки Уссури У Дачэн “не мог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проводить обследование”, это привело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к “появлению некоторых вопросов”. Самый важный среди них – это вопрос о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и острова Большой Уссурийский (Хэйсяцзы-дао). В вопросах захват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демаркации границы, в отличие от русских, оспаривавших каждую пядь земли, У Дачэн считал себя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м “небесной династии”, “страны, соблюдающей этикет и ритуалы”, оказывающей благодеяние, милость “чужой стране”.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У Дачэн; Хуньчуньский протокол; пограничные осложнения в позднюю эпоху династии Цин